

「英雄神話」的符號生產—— 葉慈悼亡詩之羅伯特·格雷戈里的 身份建構

楊 珊*

馮 偉

摘 要

為悼念格雷戈里夫人之子羅伯特·格雷戈里，葉慈曾作詩四首：〈綿羊牧人與山羊牧人〉、〈追憶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愛爾蘭飛行員預見死亡〉以及〈報復〉（生前未發表）。前兩首充滿對羅伯特完美人格的誇讚，第四首則以直白政治詩的姿態毫不留情地批判羅伯特不負責任參戰的個人主義行為。這種轉變往往被視為反映葉慈「二律背反」式哲學的證據。本文認為，悼亡詩中的歷史事實不能僅以形而上哲學概括，而是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和文化語境以揭示葉慈對羅伯特身份建構的動因。而〈飛行員〉中彰顯愛爾蘭性的神話符號與表徵階級立場的地理符號衝突，反映了英國殖民末路下英一愛階級的民族身份焦慮和戰爭下秩序顛倒世界中的主體性危機，葉慈在四首詩中的情感突轉實則為其探索主體性危機出路的詩學補償。

關鍵詞：〈一愛爾蘭飛行員預見死亡〉、符號衝突、身份建構、主體性危機、詩學補償

* 本文 110 年 5 月 16 日收件；110 年 11 月 29 日審查通過。

楊珊，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 (shan.yang@mail.sdu.edu.cn)。

馮偉，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arthurfw@hotmail.com)。

The Symbolic Production of the Heroic Myth: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W. B. Yeats's Elegies for Robert Gregory

*Shan Yang**

Wei Feng

ABSTRACT

In memory of Lady Gregory's son Robert Gregory, Yeats composed four elegies: "Shepherd and Goatherd," "In Memory of Major Robert Gregory," "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 and "Reprisals" (unpublished). In the first two poems Yeats extolls the ideal man Major Gregory, while in the politically charged "Reprisals," he assaults Robert's irresponsible individualistic behavior of joining the army. This article maintains that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as indicated by the conflicting symbols in "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 cannot be possibly reduced to metaphysics. Thus, contextualizing this poem within the history of the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World War I,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conflict between symbols that reconstruct history. Through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finally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emotional reverse along with the conflicting symbols of identity anxiety and subjective crisis are reflections of Yeats's exploration of poetic compensation out of the predicament by drawing spiritual power from Occultism.

KEYWORDS: "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
conflicts of symbols,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subjective crisis, poetic compensation

* Received: May 16, 2021; Accepted: November 29, 2021

Shan Yang,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shan.yang@mail.sdu.edu.cn).

Wei Fe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arthurfw@hotmail.com).

羅伯特·格雷戈里 (Robert Gregory) 是葉慈友人格雷戈里夫人之子，1915 年加入英國皇家空軍團 (Royal Flying Corps) 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 年 1 月在一次戰鬥中犧牲。葉慈受格雷戈里夫人委託，先後創作四首悼亡詩：〈綿羊牧人與山羊牧人〉 (“Shepherd and Goatherd”；1918)、〈追憶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 (“In Memory of Major Robert Gregory”；1918)、〈一愛爾蘭飛行員預見死亡〉 (“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1918)、以及最後未發表的〈報復〉 (“Reprisals”；1920)。¹ 〈追憶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將他塑造成富於浪漫色彩的「西德尼爵士」 (Sir Philip Sidney)，毫無保留地讚揚羅伯特文藝復興英雄的完美形象；而未發表的第四首詩則一反前兩首中的褒揚，斥責羅伯特年輕氣盛為戰鬥樂趣而離開祖國，淪為為宗主國白白斷送性命的「受騙者」 (Yeats, *Poems* 568)；〈飛行員〉位處其中，是前後詩歌情感的戲劇性變化之轉折。對於四首詩的情感轉變，學者多從二元悖論的角度解讀。皮克林 (Edward D. Pickering) 認為飛行員的悲劇是「葉慈式的詩性意志」 (Yeatsian poetic of will) 對宿命現實世界的拒斥 (80-87)。貝爾 (Vereen M. Bell) 將其解讀為靈魂與自我的對話，闡釋了歷史的客觀性不受個人主觀意志左右之主題。值得一提的是，他指出詩中歷史與儀式的邊界模糊，並探討〈飛行員〉中歷史倫理之辯 (88)。諾斯 (Michael North) 認為這組悼亡詩反映了葉慈在責任和自由之間的艱難抉擇 (17)。此類解讀有理有據，因為在葉慈看來，詩歌是「爭辯」的藝術，《幻象》 (*A Vision*) 也揭示了他辯證的認知特點 (Nally, *Envisioning Ireland* 11)。然而以上批評往往忽視歷史事實，將

¹ 此處詩的時間及後文中引用葉慈詩的時間均以《葉慈年表》 (*A. W. B. Yeats Chronology*) 中的時間為參照，〈追憶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詩完成時間與發表時間均先於第三首詩〈飛行員〉；前者完成於 1918 年 6 月 14 日，同月 30 日開始創作〈飛行員〉；八月份〈追憶〉率先發表 (Kelly 200)。

飛行員限制在詩歌意象符號內部闡釋，把羅伯特作為哲學詮釋的完美化身，從而使該詩組成為形而上哲學論證的附庸，忽視其現實根基。

瑞爾（Kevin Riel）將詩歌創作歷史納入闡釋，重新對四首「悼亡詩」進行界定，從葉慈與羅伯特緊張的私人關係出發，置疑〈飛行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葉慈的個人意願。由此〈飛行員〉從「悼亡詩」的預設邏輯中脫離而出，成為一首現代反戰詩（1-15）。但瑞爾的闡釋簡化了該詩結構和意象上的複雜度，依據葉慈對羅伯特的私人情感否定〈飛行員〉中悼亡詩的元素，不足以使人信服，且「反戰」主題有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宏大主題概括所有戰爭的嫌疑，忽視葉慈也曾創作過煽動性極強的《胡里漢之女凱薩琳》（*Cathleen Ni Houlihan*）一劇的事實。惠特（Marion Witt）主要比較了〈牧人〉和〈追憶〉兩首詩在悼亡詩形式上的區別，揭示了該體裁從〈牧人〉中的「田園哀悼詩」傳統到融合了愛爾蘭意象與悼亡詩體裁的〈追憶〉之過渡，但不足之處在於他沒有涉及〈飛行員〉和〈報復〉（113-15）。該分析雖加深了讀者對悼亡詩體裁的理解，但他對內容的忽視卻削弱了悼亡詩作為公共媒介的社會功能。

以上研究為本文充分挖掘〈飛行員〉中意識形態話語和葉慈的詩學理念帶來了啟發。本文結合社會歷史語境和悼亡詩的文化背景，從〈飛行員〉出發闡釋整組悼亡詩中的符號衝突，進而揭示情感轉變的動因——在愛爾蘭走向民族獨立之際，葉慈的民族身份焦慮和戰爭下由現實之荒原引發的存在危機。悼亡詩組中構建的多重現實正是葉慈探尋民族身份焦慮與主體性危機之出路的詩學實踐。

在創作過程中，愛爾蘭政局動盪，歷史在被改寫，每首悼亡詩都落在不同的語境。具有「英—愛貴族」這一特殊階級身份的葉慈，也在詩中表現出動態的間性文化（Inter-ness）特徵。這不僅體現在文化相容的

民族主義觀點上，還體現在政治性與詩性的融合這一符號生產上。本文首先從悼亡詩組中羅伯特身份建構符號的矛盾性著手，剖析引發葉慈情感變化的主要矛盾，從而揭示其動因及其背後的意識。符號生產的具體特徵可從〈飛行員〉一詩獲知。它是整組詩情感變化的過渡：第一首〈牧人〉借鑒斯賓塞（Edmund Spenser）的「田園哀悼詩」傳統，通過兩位牧人的對話塑造了羅伯特浪漫牧羊人的形象。第二首〈追憶〉將情境移回愛爾蘭，開篇以葉慈於巴列利塔（Thoor Ballylee）中緬懷故人為情感觸發點，以三位故人分別反映格雷戈里人格的某一方面，毫不吝嗇地讚美羅伯特為擁有完美人格的「文藝復興英雄」。〈報復〉卻以直白的政治詩的形式批評了羅伯特沉迷戰鬥樂趣的狂熱。唯有創作〈飛行員〉時，葉慈在悼亡詩的儀式性和神秘場中，融入了相當部分的「現實」。指涉現實的個人身份符號與悼亡詩體裁內在的儀式性之間顯現出極大張力，集中凸顯了整組詩的矛盾。從此詩入手，便能揭開更大的衝突。從細處看，〈飛行員〉中一共呈現了兩組符號建構的過程：建構飛行員的愛爾蘭身份的神話符號，以及建構階級身份的地理符號。神話符號的超然性與地理符號傳達的政治性產生了衝突。為深入理解這種符號衝突，本文回歸歷史語境，分別解構標識愛爾蘭性的神話符號與階級立場的地理符號。這種寫作策略揭示了詩歌下掩藏的社會意識漩渦，以及英一愛貴族身份建構後呈現的民族身份焦慮以及戰火下現實之荒原引發的主體性危機。

一、神話符號與地理符號的張力：羅伯特的雙重身份建構

在〈飛行員〉中，葉慈刻畫了一名超脫世俗的飛行員形象，純粹的喜悅和孤獨是他參加空戰的原因。他儼然愛爾蘭英雄庫丘林（Cú

Chulainn) 和烏辛 (Oisín) 的化身：摒棄了物質與世俗的羈絆奮力追尋靈魂的雀躍，試圖打破現實世界的牢籠進入純然的精神空境。飛行員掙脫現實去往的精神國度是「雲端」，超脫世俗利益之所在和靈魂永恆的歸宿。在詩中，「雲」出現兩次，分別借代「天空」和「空中戰場」。「我知道我會喪生／雲層中某個所在」，「只為寂寞中一股喜悅的衝動／驅使我置身這雲中的喧囂」(Yeats, *Poems* 135)。在詩中，「雲」的流動性使其不拘於物、超然物外，其虛無縹緲的特質創造了神秘的空間，充滿「動態力量和能量之流」(韋秀玉 159)。以意象探索神秘空間是同時期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精髓，² 詩人在其影響下發掘這一模糊場所的儀式性能量(包括無意識寫作和儀式戲劇的實踐)，以此替代田園悼亡詩中固化的意象。除空間的神秘性外，〈飛行員〉的神秘感也突出表現在「預見」死亡這一儀式行為中。在神秘儀式上，靈媒往往能通過儀式行為溝通生者與死者、此生與彼世，而在葉慈參與的降神會上，羅伯特曾多次出現在靈媒的幻境中。³ 降神會和通靈體驗是葉慈詩歌和戲劇創作的靈感來源。在《幻象》中，葉慈稱靈媒感應到的材料不是為了讓他「浪費時間費力解釋它的含義，而是為他的詩歌提供隱喻」(Yeats, *Vision* 8)。因而，詩人將〈飛行員〉視為一場神秘儀式，以「雲」構造了一個時空屬性模糊的不可知的儀式空間。不難理解為何詩人將羅伯特置於這一時空屬性模糊的儀式空間。靈動的韻律跳躍在神秘的異度空間中，重複(repetition)、重章疊唱(refrain)和交錯配列法(chiasmus)交織使用，強化了儀式氛圍，在反復的吟誦中羅伯特進入永恆世界。

² 二十世紀初超現實主義流派以繪畫和詩性語言表現詩性精神意蘊。其圖像的顯著特點就是將視覺領域物象的時間置於靜止的狀態，讓觀者構想一個充滿動態力量和能量之流的世界(韋秀玉 159)。

³ 在1916年降神會上，靈媒倫納德夫人(Mrs. Leonard)在幻境中曾見到羅伯特·格雷戈里，稱在另一世界中見到他和胡·蘭恩(Hugh Lane)形影不離(Nally, "Leo Africanus" 58)。

儀式空間中的符號相互聯繫，指向追求精神超脫的愛爾蘭英雄。在詩中，消融了主體身份的飛行員為追求極致的快樂，不顧一切地逃離庸俗的物質世界，飛往精神的異度空間。他的參戰動機並非政治利益和名譽，而是心靈的狂喜：「令我出征的既非法律、責任，亦非達官顯貴，或歡呼的群眾」，而是「寂寞中一股喜悅的衝動」（Yeats, *Poems* 135）。這段自白透露了諸多重要信息：「愛爾蘭戰士」、「追求戰爭的快樂」、「靈魂深處的熱情」和「精神超越生命圓滿」。熟悉凱爾特神話的愛爾蘭讀者通過意象的自然聯繫，腦海中浮現出庫丘林的形象。他是「戰士」、精神超越與英雄悲劇三者最完美的詮釋，表現出「凱爾特心靈中深藏的那種無邊的、難以言喻的張狂」（葉芝，《凱爾特鄉野敘事》18）。凱爾特精神的另一承載者烏辛同樣也擺脫現實、掙脫束縛而進入雀躍的精神世界。三位人物都是追求「一體性」英雄悲劇⁴的化身（周曉陽 69），以不同的形態表徵在葉慈的詩中。

不論是庫丘林、烏辛還是飛行員都在追尋一種「無用的美德」（Riede 401），他們棄絕外部物質世界，毅然轉向心靈世界，開展近乎「超驗主義」的自我探尋（Ryan 3）。這種「不可思議的凱爾特精神」充滿了「超越生命局限，投身於無限性的強烈張力」（葉芝，《凱爾特的薄暮》18）。經過符號化，羅伯特失去了歷史的肌理，在儀式中成為鄙夷、棄置、超越世俗世界的愛爾蘭英雄。在〈飛行員〉的儀式場中，神秘的儀式空間、觀眾的認知方式、愛爾蘭神話符號三者互為呼應，愛爾蘭人民與體現著愛爾蘭性的英雄符號融為一體，促成了符號對身份建構的儀式。

⁴ 「一體性」（unity）最早由羅斯（David A. Ross）在《葉慈文學批評指南》（*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裡提出，羅斯認為葉慈的「自我一體性」指的是某種充滿激情地追求個性的完整：行動者與藝術家個性的一體性、想像與意志的整一性（51）。但周曉陽認為「一體性」強調的是對於深入表像之下的真正的生命的觸及，為此必須擺脫世間俗物的干擾，不為人世間的情緒所左右，更不必屈從於理性分析，而是懷著對神秘世界的敬畏之情，一心探究生命循環往復的秘密（周曉陽 69-78）。

符號系統總是不穩定的，而符號間的關係則更為複雜，不同符號的衝突與矛盾並不會因其顯在的橫組關係而消弭。在〈飛行員〉中，與神話原型並列的是另一組符號，它背離了超然的形而上世界，折射出熠熠生輝的人性。飛行員在心裡念叨「我的家鄉是基爾塔頓；我的鄉親是基爾塔頓的窮人」（葉芝，《葉芝文集卷一》106）。「基爾塔頓」（Kiltartan）因此從神話秘境中浮現，成為飛行員的唯一身份標識。它指向愛爾蘭的一個民政教區（civil parish），但比起地理標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傳達的文化和政治內涵。羅伯特居住於庫勒莊園（Coole），基爾塔頓僅為其周邊的一個小教區。葉慈選擇基爾塔頓而非庫勒莊園，緣由在於基爾塔頓背後的文化和歷史內涵。從地理上來說，基爾塔頓面積不如庫勒莊園，但其觸發的記憶是「人民之書」（the people's book）《基爾塔頓歷史書》（*The Kiltartan History Book*），是格雷戈里夫人數十年如一日地定期前往基爾塔頓為庫丘林故事搜集素材的場景，是她在《穆特海姆的庫丘林》（*Cuchulain of Muirthemne*）的書扉頁上寫上「特別獻給基爾塔頓人」的記憶（M. Murphy 40）。基爾塔頓這一文化符號彰顯的是格雷戈里代表的精英貴族與底層凱爾特人民在文化傳承上的高度統一，是愛爾蘭文藝復興追求的統一民族主體的目標。

地理符號是影響讀者情感的關鍵，葉慈和格雷戈里夫人都深諳此道。在整組悼亡詩的創作過程中，格雷戈里夫人與遺孀瑪格麗特·格雷戈里（Margaret Gregory）是影響葉慈對羅伯特形象塑造的因素之一。在創作〈追憶〉時，葉慈在格雷戈里夫人的要求下新增一個詩節以強調羅伯特的勇敢，其中「戈爾韋（Galway）」、「泰勒城堡（Castle Taylor）」等地理位置亦為精心篩選的結果（Yeats and Parrish 51）。〈飛行員〉中的地理符號有意識地重塑了庫勒莊園主人（羅伯特·格雷戈里與威廉·格雷戈里〔William Gregory〕）的形象，將其打造成與愛

爾蘭底層人民共進退的模範地主。無獨有偶，威廉·格雷戈里作為愛爾蘭人民的模範地主的形象，在格雷戈里夫人為其重新編撰的自傳及其書信中也有體現（Remport 60）。由此，羅伯特心繫鄉民的少主形象與威廉宅心仁厚的老地主形象如出一轍。不論是「基爾塔頓」的地理符號，悼亡詩組中的悉心編排的地理位置，還是威廉書信集中有意安排的語言符號，都旨在以話語模糊政治立場上的對立，彰顯貴族與貧民立場之同一——文化符號背後的政治性在此顯露無疑。

在神話符號運作的虛空之中，飛行員本應如庫丘林一樣無所顧忌地擁抱極致的快樂，在精神的癡狂中走向生命的終結。然而〈飛行員〉中的地理符號卻掙脫神話的虛空，指向羅伯特的階級立場。飛行員成為基爾塔頓人民擁護的理想地主、凱爾特歷史和文化的守護者。地理符號的政治性與神話的超然性在文本之中形成無法調和的矛盾。二者之間的矛盾呈現在詩的表層上就是意象的悖論、飛行員分裂的人格、詩歌風格的突變：這也是關於〈飛行員〉主題闡釋頗具爭議的原因。

在〈飛行員〉中，詩人以符號模糊了歷史與神話之間的界限，將歷史概念化並昇華至非現實的語境。深諳符號神奇力量的葉慈，在〈悲劇劇場〉（“The Tragic Theatre”）中闡述道：悲劇效果由符號的「韻律、平衡、範式和能引起共鳴的古老的意象」實現，弱化人物的個人特點，他還強調這一機制是當我們在混沌狀態下運作的（Essays 243）。此外，不論是他的詩歌還是劇作，都是一個符號充盈的世界，掌握符號的運作規則，就能操控歷史的呈現方式。

葉慈利用符號的強烈感召力，營造流動的空間和創造神話人物原型，構建降神儀式中的超現實場域，使讀者進入時空模糊的境地。在流淌著精神力量的神秘儀式中，歷史的真實感被極大弱化進入神話的虛空之中。然而符號分屬的場域之間不可磨滅的矛盾，在詩的多重悖論之中

達到高潮：其一，歷史的物質性與儀式空間的模糊性互為反照；其二，戰鬥行為的政治性與飛行員情感的超然性相衝突；其三，飛行員的人民立場的階級性與棄絕世俗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式英雄相矛盾。為解釋詩中的多重悖論，必須還原詩歌中的歷史語境，從符號表層出發，復原其真實歷史語境，揭露操縱著符號運作的意識形態。

二、英雄神話的解構：羅伯特的身份之歷史錯位

葉慈將羅伯特參戰動機歸為「孤獨和突然的喜悅」，而非傳統意義上正義之戰或政治利益的訴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羅伯特是堅定的英一愛階級的守護者，參戰是他多方權衡後的抉擇。葉慈的傳記作者福斯特（R. F. Foster）對《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暴動事件的記述中，羅伯特對新芬黨（Sinn Féin）的敵對態度中顯露出其強硬的政治立場：反對愛爾蘭獨立，維護英一愛貴族階級統治下的愛爾蘭自治（363）。他稱獨立派的民族主義者為「有組織的挑事者」（organized disturbers）和在都柏林「實施恐嚇的人」（organized intimidation），認為必須有人站出來代表集體與他們抗爭，而他是唯一做到的人（Foster 363）。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民族自治進程不得不「無限期擱置」，⁵他毅然參加了英國部隊，代表英一愛階級為愛爾蘭自治而戰。⁶對於英一愛地主而言，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分裂已成定局，為了避免歷史向不可控的方向發展，他們更願意向愛爾蘭自治妥協，而不是擁抱一個獨立的平均主義的愛爾

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幾個星期內，面向整個愛爾蘭的自治議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這部法律由國王簽署，收入《法律全書》（*Statute Book*），將在十二個月之後或戰爭結束時生效，以二者中較長的時間節點為準。

⁶ 當英國政府與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達成戰時協定：以戰爭結束後的愛爾蘭自治為條件鼓勵愛爾蘭青年參與英國戰場，此時愛爾蘭民族派的當務之急就是為英國在戰爭中的勝利作出自己的貢獻（基 178）。

蘭。戰事爆發時，羅伯特育有三個孩子，且其年齡對於飛行員來說實屬高齡，他離開安逸的環境加入皇家飛行團是為了家族和英一愛優勢階級的未來，而非「無關政治」的衝動行為（Bell 84）。他在戰鬥中表現出色，被授予十字勳章，去世前已成為知名飛行員。羅伯特立下的赫赫戰功絕不是超然至虛無的英雄能達到的成就，亦不是一個衝動加入戰場後又感受到人生無意義的飛行員所為。由此，詩中塑造的感召靈魂衝動的英雄形象不攻自破。

頗有意思的是，雖然〈報復〉中葉慈的情感和詩歌描述的情境與〈飛行員〉完全不同，但羅伯特的熱血戰士形象卻如出一轍。在〈報復〉中葉慈將羅伯特直接置於愛爾蘭戰爭的背景，消解了前三首悼亡詩的浪漫情境，反而描述了自他去世後英國士兵在愛爾蘭的暴行。葉慈指責他棄愛爾蘭人民於不顧，當人民遭受暴行時，他卻為了戰爭的樂趣而拋棄國內戰場。葉慈令他從「義大利的墳墓」中起來，回到自己家鄉看看基爾塔頓的人民，對自己加入英國戰場的行為「再三思考」（Yeats, *Poems* 568）。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首詩的連續性——格雷戈里上校的形象。即使〈報復〉點出愛爾蘭獨立戰爭的背景，且改變了對參戰這一事實的態度，「再三思考」與「戰爭的樂趣」所指涉的仍然是一位庫丘林式的追求現實超脫的戰士形象，因靈魂狂喜的衝動而加入戰爭。葉慈批評他，僅因為在面對世俗責任與精神追求的艱難抉擇之間，他最終選擇忠於天賦、忠於靈魂，放棄守護人民的責任。

儘管生命的激動片刻

勝卻其他無數平凡年月，你說，

戰鬥的樂趣如此寶貴

無憾懷抱記憶死去，

它趕走其他一切顧慮。
但請你走出義大利的墳墓，
飛回基爾塔頓
深思直到悔悟
曾經加入的戰場 (Yeats, *Poems* 568)⁷

庫丘林的英雄原型被不斷深化以掩蓋羅伯特真實的參戰動機：為英一愛貴族的階級利益而戰、為自治的愛爾蘭而戰。他們選擇加入戰場表達對英國的忠誠，以此換得愛爾蘭在英國授權下的自治。葉慈將羅伯特民族身份與戰爭背景間離，以愛爾蘭神話英雄突出表現其「愛爾蘭性」的一面，遮掩了羅伯特英一愛身份中英國性的一面，將其參戰原因與政治利益分隔，此為〈飛行員〉和〈報復〉中的英雄神話被解構後顯現出的政治意識形態。

葉慈對羅伯特階級身份的建構還包括第二重因素——階級身份。在基爾塔頓的地理符號的作用下，他突出了格雷戈里家族愛爾蘭民族守護者的階級形象，掩飾了英一愛優勢階級與佃戶之間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階級矛盾，而這種矛盾僅憑文化符號之力是無法消除的。

在進一步闡釋之前，可先對格雷戈里家族所代表的英一愛優勢階級的歷史稍作考察。英一愛優勢階級是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棋子。作為兩種文化中的「他者」(Nally, *Envisioning Ireland* 33)，他們與愛爾蘭人民處於複雜的矛盾糾葛中：殖民與被殖民的對立，優勢階層與其他階層對立，新教與天主教的對立。因此，「雙方均難與對方產生文化認同感」(陳麗 3)。加之土地糾紛始終橫亙在依賴佃戶經濟的貴族與貧窮的愛爾蘭農民之間，饑荒年記憶依舊歷歷在目，大量貧農因無力交租被地主

⁷ 此詩存在多個版本，本文引用愛爾蘭國家圖書館中存檔的原始更正版，而非經過葉慈夫人修飾過的版本。

驅逐，最終淪為餓殍（格羅斯曼 73）。為支持驅逐政策，時任愛爾蘭國會議員的威廉·格雷戈里還擬定了臭名昭著的「格雷戈里條款」（Gregory Clause），該條款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殺戮和驅逐機器」（O'Brien 278）——階級對立的歷史淵源可見一斑。當土地改革中階級矛盾激化時，「模範地主」格雷戈里夫人的反應卻讓人咋舌。

曾公開聲明支持埃及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格雷戈里夫人在這場土地戰爭中表現得相當冷漠。在《愛爾蘭土地戰爭》（*The Land War in Ireland*；1912）中，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記述了當他為了愛爾蘭土地改革的問題特地去拜訪在倫敦的格雷戈里夫人一事。「她在愛爾蘭土地問題上絲毫沒有表現出對愛爾蘭農民的同情」，而原因在於格雷戈里夫人的貴族立場（146）。將其揣測坐實的是格雷戈里夫人的日記。日記反映了她政治立場的轉變：從支持聯合退而接受自治。由於無法忍受越發響亮的獨立呼聲和被土地革命削弱後的莊園現狀，1893年她甚至匿名發表小冊子《朝聖的幻影》（*A Phantom Pilgrimage*），此書或稱《自毀》（*Home Ruin*；與 home rule 相對），反對國族主義（Tóibín 116）。

但她的政治立場也隨著愛爾蘭國內的政局變化開始轉變。布朗特同樣記述了這一轉變過程：在他拜訪的同年夏天，保守黨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政府失勢，格雷戈里夫人對土地改革的態度有所緩和，布朗特將此讓步歸結為政治風向的轉變（Blunt 145-47）。愛爾蘭獨立戰爭期間，政治風氣朝夕萬變，社會輿論、政治環境、階級立場等方方面面都會引發各種適應性舉動。格雷戈里夫人在政治立場上的讓步便是明證。格雷戈里家族代表的優勢階層在面對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逐漸減退時採取了防衛姿態，表明放棄世代積聚的家族遺產或是將土

地所有權讓渡給農民，不是她可以犧牲的利益。而葉慈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回應則是 1920 年的第四首悼亡詩〈報復〉。

〈報復〉雖指責羅伯特替英國參戰的事實，但實際是出於維護格雷戈里家族貴族理想形象的目的：葉慈將羅伯特失職的行為完全歸結於個人衝動，撇清他與整個格雷戈里家族的關係。在放棄了對羅伯特參戰既定事實的辯護後，葉慈轉而維護格雷戈里家族的良好形象：「然敬你父親之屬／皆中彈曝屍曠野」（Yeats, *Poems* 568）。在此，威廉·格雷戈里依然是受人尊敬的地主。〈報復〉中威廉·格雷戈里的理想形象，與格雷戈里夫人在編輯其夫自傳與書信之時中經過篩選信息塑造的完美地主形象幾近一致。因此，羅伯特的行為不能代表格雷戈里家族的立場，格雷戈里家族依舊是模範地主。然而，威廉·格雷戈里遠非地主中的模範，他無法擺脫經濟剝削帶來的優勢生活，亦不能真正做到體恤佃戶，承擔作為地主的責任。其代表的盎格魯—愛爾蘭特權階級能做出的最大讓步，是懷抱文化民族主義的理想，塑造一個雜合的「愛爾蘭」身份。

〈飛行員〉和〈報復〉中英—愛貴族超脫的戰鬥英雄形象與愛爾蘭人民「物質上的貧民，精神上的貴族」形象本質上都是對物質世界的棄絕和對物質主義的鄙夷，是宣揚精神自由的愛爾蘭性對被物質欲望吞噬的英國性的抵制。由此，羅伯特英—愛身份中的英國性在儀式場中被消解。而在第二層世俗現實層面，〈飛行員〉中的地理符號再一次鞏固了貴族與愛爾蘭貧民的聯合，〈報復〉則進一步披露了英愛分裂給當前社會造成的混亂，以懷舊式的口吻構建十九世紀初期英—愛貴族統治下的和諧社會圖景。在多方話語建構之下，貴族地主英—愛身份之間性消融於須臾。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說：「逐漸喪失了政治和經濟權力的盎格魯—愛爾蘭知識份子試圖將他們的『間性地位』轉化為創造力。也許這種連字號標識的間性可能會成為橋梁而不是障礙，因為那

些輾轉於倫敦與愛爾蘭大房子之間的貴族可以將自己塑造為愛爾蘭文化衝突的無私調節者」（54）。故而，葉慈在這兩首詩中呈現的雙重「現實」：形而上世界的現實與形而下社會的現實分別打破了民族身份和階級身份的界限，且形而上世界與形而下現實相互聯繫，互為補充，共同建構了葉慈所期望實現的英—愛貴族與愛爾蘭人民擁有統一身份的有機世界的願景。

三、建構的神秘主義詩學邏輯：葉慈的主體性危機之出路

葉慈通過符號在〈飛行員〉中建構了雙重現實：表徵階級身份的社會現實與神話英雄所處的形而上現實，它們使羅伯特拋卻歷史的紛亂載入永恆神話。然而，羅伯特身份的瓦解最終會顯示出詩人建構背後的社會意識。那麼，葉慈在〈飛行員〉中構建雙重現實與葉慈所處的現實世界有何關聯？緣何詩人在人生的此階段產生了此般現實觀呢？以上問題的解答仍需從葉慈的建構入手。

階級身份層面的動因昭然若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愛爾蘭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以葉慈為代表的英—愛優勢階級在愛爾蘭人民的民族仇恨的威脅下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身份認同危機。雖然這種身份焦慮一直籠罩著日趨衰敗的「大房子」（big house）家族，但唯有在創作〈報復〉時達到頂點，該詩的政治功用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飛行員〉作於 1918 年，〈報復〉作於 1920 年 11 月，準備發表於政治立場鮮明的民族主義報刊《民族報》（*Nation*）上，此時距羅伯特犧牲已兩年之久。革命的終局已經無法扭轉：愛爾蘭共和派 1918 年 12 月在選舉中獲勝，1919 年 1 月 21 日愛爾蘭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⁸ 葉慈重提往事，補充了這首批

⁸ 葉慈對英—愛貴族身份之焦慮還體現在其詩作〈二次降臨〉（“The Second Coming”）中。此詩創作於 1919 年 1 月，恰逢共和黨人宣佈成立愛爾蘭共和國，由此可知所謂「新紀元」的政

判羅伯特的行為卻只觸及皮毛不及內裡的詩。彼時舊日貴族命運日薄西山，特權階級的身份使得他們處於政治鬥爭的中心。在該語境下，對羅伯特身份重塑便變得尤為重要。權衡之下，葉慈將〈飛行員〉中神秘化的部分揭開，以退為進地保全格雷戈里家族，因而在〈報復〉中呈現出批判態度。對於這首充滿政治影射意義的詩的意圖，葉慈在給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坦言道：將這首詩寄往《民族報》，「不是因為它可能成為一首好詩，而是因為我認為它可能會觸動某個有權勢的人」（Bell 88）。格雷戈里夫人認為這不是一首「真誠」的詩，可能會傷及羅伯特遺孀瑪格麗特的心，葉慈聽從了格雷戈里夫人的請求，生前並未讓此詩面世（D. Murphy 207）。〈報復〉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悼亡詩，其強烈的情感態度折射出狂熱的革命鬥志在愛爾蘭大地蔓延之時英一愛優勢階級面對民族仇恨、階級仇恨的身份焦慮。

然而民族身份認同焦慮僅闡釋了葉慈構建階級身份的動機，卻不能解釋神話英雄原型所處的形而上世界。這一超現實世界在四首悼亡詩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它們共同構成葉慈為羅伯特建構的多重現實：從牧羊人漫步的鄉村田園，文藝復興的英雄策馬馳騁的愛爾蘭土地，到庫丘林與烏辛飛向的雲端。因此，若要揭開羅伯特逃離的形而上世界背後的意識，須將四首悼亡詩對悼亡詩原型意象、詩歌結構的變化作為研究對象。葉慈對悼亡詩傳統的遵照與偏移是其基於現實和詩性的反思，在這組悼亡詩中，他完成了從浪漫主義詩學轉向神秘主義詩學的過渡，詩學實踐標志著他由民族身份認同危機上升到現代荒原景象下對存在拷問的主體性危機。

治隱喻（葉芝，《葉芝文集卷一》150）。在詩中，葉慈把《馬太福音》耶穌基督重降人間的預言和《約翰書》「偽基督」（antichrist）於末日之前到來的預言相結合，寓示帶有毀滅性的新紀元的到來，影射剛成立的愛爾蘭共和國對於英一愛優勢地主階級並非天堂而是地獄，英一愛階級的自危之態顯露無疑。

在悼亡詩組中，羅伯特從浪漫詩意空間進入非理性想像空間，這種多重現實的建構過程對應悼亡詩體裁的轉變，並與詩學實踐的轉變相呼應。這種詩學轉變是葉慈對現實認知轉變的明證，更表明了他對身份認同的危機深化為對身處的現實反思。〈牧人〉中葉慈借鑒了斯賓塞的田園悼亡詩形式，到〈飛行員〉中的悼亡詩傳統元素已幾不可辨。羅伯特的身份建構是更直觀的表現：〈牧人〉、〈追憶〉、〈飛行員〉和〈報復〉四首詩中羅伯特身份依次從「牧羊人」到「文藝復興英雄」最終變為神話英雄「庫丘林」（後兩首）。在創作初期，與葉慈的預期相反，被寄予厚望的〈牧人〉受到多方批評，羅伯特「牧羊人」的形象被認為是失敗的刻畫（Witt 16）。〈追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了「文藝復興英雄」的形象。該詩在當時的接受也褒貶不一，戈登（D. J. Gordon）認為該詩的「溢美之詞」過於「考究」，而羅伯特的形象也充滿著「不確定性」（32），布魯姆（Harold Bloom）作出了同樣的評價（194）。

前兩首悼亡詩的失敗引發了葉慈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在應對二十世紀現實引發的主體性危機時浪漫主義愈發顯示其無力。其根本原因在於浪漫主義已無法在現實中找到寄寓希望的處所，以逃避被戰爭撕裂的現實。十八、九世紀時，工業瘋狂吞噬自然空間，田園空間的流失引發了精神恐慌，浪漫主義藉機佔據主流詩學審美。浪漫主義詩學建立在可區隔的空間觀上：儘管工業化加速了「伊甸園」理想的消退，但總有一隅詩意棲居位於世界盡頭或與世隔絕的鄉村。⁹ 因此，代表浪漫主義作家心之所向的伊甸園反復出現在該時期作品中。當葉慈以為浪漫主義仍能開闢一方遠離社會現實的空間以逃離紛爭、躲避現實時，現實當即做出無情的回應。彼時，伊甸園在愛爾蘭的現實中已不復存在，在現代化的裹挾之下，貧瘠的鄉村與商業化的擁堵區錯落（Freeman 2），國際繁華

⁹ 在浪漫主義的地圖上，「心靈與其客體分離，而這些客體被放置在一個主要的視覺空間之中，在這個空間中，每個空間都與其他的空間分離」（Miller 8）。

都市與閉塞貧窮的島嶼同在，伊甸園成為民族記憶之觴。於是田園悼亡詩傳統創作的〈牧人〉受到廣泛的質疑，浪漫的牧羊人挽歌無法使羅伯特融入「永恆的自然輪回」——而這正是悼亡詩的目的之一（Sacks 19）。同理，詩性的伊甸園亦無法消除葉慈和二十世紀讀者對現實的焦慮，最終，葉慈早期浪漫化的「現實」觀幻滅，浪漫田園理想的破裂使葉慈不得不直面二十世紀碎片化的現實。葉慈在各執一詞的評論聲中逐漸意識到他所處的現實之變，由此產生了後面兩首自發創作的悼亡詩。到〈飛行員〉時，雖傳統悼亡詩體裁已無法識別，葉慈卻從愛爾蘭神話中發掘神秘儀式的潛力，突破了早期詩歌對浪漫意象的偏好，將神秘世界的象徵、工整的形式（四個四行詩）和縈回的韻律統一於神秘儀式的詩學實踐。因此，悼亡詩從浪漫主義詩學的破滅到神秘主義詩學的形成，映射了葉慈主體性危機不斷深化的過程。

將希望寄託在現實中的幻想逐漸走向破滅的過程同樣體現在詩歌的意象之中，〈牧人〉中悼亡詩採用牧羊人的笛子這一原型意象，到〈追憶〉中通向精神世界的象徵——巴列利塔；而〈飛行員〉則更進一步，縹緲流動的雲層直接構成精神力量充盈的儀式場域。由此，葉慈有效地將悼亡詩這一體裁從陳舊的田園哀歌轉變為天啟式崇高，因而〈飛行員〉中羅伯特在社會現實與形而上「現實」間切換是儀式場的「魔法」（Yeats, *Essays* 50）。當現實中已無淨土，浪漫主義所守護的心靈家園最終淪為現代主義的精神廢墟，葉慈只能以神秘主義從純粹的非理性的精神世界中重建秩序。

從現實層面進入非理性世界是葉慈在詩學實踐中對現實的反思，是對民族身份的割裂感、戰爭下現實的碎片感與存在的無意義感的回應。同時與社會現實相對的是個人生命體驗對現實認知方式的轉變，該轉化間接催生了非理性現實的建構。創作悼亡詩組時，葉慈處於人生新階

段，摯友的去世、女兒的出生等均激發對生與死之思考。第二首〈追憶〉中，葉慈開篇便描繪了他于「巴列利塔」中回憶三位故友的情景，「巴列利塔」這一溝通此生與彼世的象徵折射出死亡帶來的主體性沉思。1919年葉慈的女兒出生，〈寫給我女兒的禱告〉（“A Prayer for My Daughter”）中，屋外是四處「嚎叫的風」，搖籃中嬰兒酣然熟睡，象徵著生命的力量與摧毀的死亡力量的並置同樣點明了葉慈的不安，躊躇幾時，他便作此禱告詩寬慰「心頭的陰翳」（Yeats, “Prayer” 59-62）。葉慈個人的生命經歷成為觸發他對神秘主義進一步闡釋與再創造的契機，戰爭背景下的身份焦慮上升到對存在拷問的主體性危機。

生死交織的魔幻個人體驗促使葉慈重新審視神秘主義的精神力量，由此，神秘主義以新姿態進入葉慈的詩歌，不再表徵為表面意象，而是通過非理性的多重現實觀影響葉慈在〈飛行員〉中構建的現實。葉慈擺脫了實證主義者的「單一現實觀」轉向神秘主義的多層次現實觀：世界不是由單一現實構成的，當下的世俗世界不過是最低層次，「世俗的世界需通過其他（形而上）層次的現實來闡釋與解讀」（Graf 8）。只有接受與解讀來自更高層次「現實」的信息才能破解當下現實的混亂，進而建構一個秩序井然的現實。儀式和圖像化的冥想（meditative visualization）是打開通往其他現實通道的鑰匙，基於其多層次的現實觀，葉慈在〈飛行員〉中通過「預見」儀式創造了另一重現實：一個有機而非碎片化、情感充盈而非精神荒蕪的世界，正是如此飛行員在雲層中由生入死的平穩過渡才得以成為可能。

悼亡詩中儀式構建的多重現實是葉慈訴諸於神秘主義的現實觀尋求消除精神荒蕪、鐫刻永恆和走出現代危機之出路的詩學探索。在神秘主義的影響下。葉慈對現實的思索已超越戰爭背景，對英—愛優勢階級的間性身份的焦慮已經上升至對愛爾蘭民族的未來、現代人存在的思考，

無名「飛行員」既是英一愛貴族羅伯特，也是「愛爾蘭」飛行員，還是每個現代人的代表。此轉變同樣反映在葉慈這一時期創作風格與主題上，悼亡詩的創作時期即為《邁克爾·羅巴特斯和舞者》（*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的創作時期，並被收錄其中。該詩集是葉慈由早期的浪漫主義轉向系統的神秘主義哲學《幻象》的過渡，集中展現了葉慈對生死、永恆等與主體存在等問題的思辨。在此背景下，神秘主義成為葉慈思考現實、反思存在的邏輯。神秘主義詩學擺脫了傳統體裁範式的田園意象、結構以及韻律的束縛，不僅為僵化悼亡詩注入新生力量，也將秩序重置回顛倒的現實，是消除主體性危機的出路。由此，葉慈選擇了一條積極的道路：認識現實、反抗現實最後重構多重現實。神秘主義詩學與哲學既是葉慈從民族身份焦慮抵達現代人的存在思考的映射，也是葉慈消除主體性危機探尋的過程的終點。

四、結論

葉慈在悼亡詩這一體裁上的實踐展現了羅伯特身份建構的動態過程，〈飛行員〉中重構羅伯特身份的符號衝突所指涉的雙重「現實」是社會背景下葉慈英一愛間性身份焦慮與主體性危機的反照。而整個悼亡詩組中羅伯特形象的轉變清晰顯示了葉慈從早期的浪漫主義轉向神秘主義的詩學實踐的過程，揭示葉慈從民族身份認同危機上升到主體性存在危機的軌跡。神秘主義不僅是其主體性危機的反照，也是走出困境的希望。葉慈在悼亡詩組中通過探索羅伯特的身份建構，構建了雙重現實以突破受民族身份、階級身份、生死和戰爭的掣肘，在對戰爭下荒原圖景的反思中走出浪漫主義詩學的定式，將神秘意象、神秘儀式與對存在的思辨結合，最終形成神秘主義的現實觀。〈飛行員〉中神秘主義哲學、

悼亡儀式和愛爾蘭神話最終結合，成為詩人、藝術家和「巫師」的葉慈重建整一世界的精神力量，也是消解存在危機的永恆歸宿。

引用書目

中文

周曉陽。〈「一體性」原則，衰亡主題和葉芝式英雄的變遷〉。《國外文學》，第2期，2017年，頁69-78。

韋秀玉。《視覺藝術語言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

格羅斯曼（S. Richard Grossman）。《格羅斯曼說，經濟為什麼會失敗》。張淼譯，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

基（Robert Kee）。《愛爾蘭史》。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

陳麗。《時間十字架上的玫瑰：20世紀愛爾蘭大房子小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凱爾特鄉野敘事：一八八八》。殷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凱爾特的薄暮》。殷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葉芝文集卷一：朝聖者的靈魂》。王家新編選，東方出版社，1996年。

英文

Bell, Vereen M. *Yeats and the Logic of Formalism*. U of Missouri P, 2006.

Bloom, Harold. *Yeats*. Oxford UP, 1972.

Blunt, Wilfrid Scawen. *The Land War in Ireland: Being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Event, in Continuation of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 S. Swift and Co., 1912.

Eagleton, Terry. *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Žižek and Others*. Verso, 2005.

- Freeman, T. W. “The Congested Districts of Western Ireland.”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33, no. 1, 1943, pp. 1-14.
- Foster, R. F. *W. B. Yeats: A Life*. Vol. 1, Oxford UP, 1997.
- Gordon, D. J. *W. B. Yeats, Images of a Poet*. Manchester UP, 1961.
- Graf, Susan Johnston. *Talking to the Gods: Occultism in the Work of W. B. Yeats, Arthur Machen, Algernon Blackwood, and Dion Fortune*. SUNY Press, 2016.
- Kelly, John S. *A W. B. Yeats Chron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Miller, Joseph Hillis. *Poets of Reality: 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 Harvard UP, 1992.
- Murphy, Daniel Joseph. *Lady Gregory's Journals*. Oxford UP, 1978.
- Murphy, Maureen. “Lady Gregory: ‘The Book of the People.’” *Colby Quarterly*, vol. 27, no. 1, Mar. 1991, pp. 40-47.
- Nally, Claire. *Envisioning Ireland*. Peter Lang, 2010.
- . “Leo Africanus as Irishman?” *Irish Studies Review*, vol. 14, no. 1, 2006, pp. 57–67.
- North, Michael. *The Political Aesthetic of Yeats, Eliot, and Pound*. Cambridge UP, 1991.
- O’Brien, G.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Union to the Famine*.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1.
- Pickering, Edward D. “The Artist’s Tragic Flight: Yeats’s Portrayal of Major Robert Gregor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32, no. 2, Winter 2009, pp. 80-99.
- Rempert, Eglantina. *Lady Gregory and Irish National Theat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Riede, Austin. "W. B. Yeats's Economies of Sacrifice: War, Rebellion, and 'Wasteful Virtue.'" *Irish Studies Review*, vol. 19, no. 4, Dec. 2011, pp. 401-02.
- Riel, Kevin. "'I do not love': Rethinking W. B. Yeats's Elegies of Major Robert Gregor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38, no. 2, Winter 2015, pp. 1-15.
- Ryan, Rory. "The Condition of Fire: Yeats and Transcendent Reality." *Yeats Eliot Review*, vol. 21, no. 1, 2004, pp. 2-12.
- Ross, David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 Facts On File, 2009.
- Sacks, Peter M. *The English Elegy: Studies in the Genre from Spenser to Yeats*. Johns Hopkins UP, 1985.
- Tóibín, Colm. "Lady Gregory's Erasures."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vol. 68, no. 1-2, Winter 2007, pp. 115-24.
- Witt, Marion. "The Making of an Elegy: Yeats's 'In Memory of Major Robert Gregory.'" *Modern Philology*, vol. 48, no. 2, 1950, pp. 112-21.
- Yeats, William Butl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Vol. 1, *The Poem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R. J. Finneran, Scribner, 2010.
-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Vol. 14, *A Vision: The Revised 1937 Edition*, Scribner, 2014.
- .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Macmillan, 1961.
- . "A Prayer for My Daughter." *Poetry*, vol. 15, no. 2, 1919, pp. 59-62.
- Yeats, William Butler, and Stephen Maxfield Parrish.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Manuscript Materials*. Cornell UP, 1994.